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投资¹

——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证据(CPES)

黄送钦² 何晓斌³ 高皓⁴

摘要 如何在政府和企业间关系中寻找一个适宜状态,实现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共商地方事宜”将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本文的研究从一种战略整合的视角考察了政企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而且还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战略管理,为企业进行“二元”战略互动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

关键词 合作建策;政商关系;企业投资;政治地位;优惠政策

DOI:10.16513/j.cnki.cje.2021.04.003

1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类型与创新绩效研究”(批准号:19BSH151)、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专项项目“企业家献策与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批准号:19THZWLJ32)的资助。作者感谢《经济研究》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武汉大学)、香樟(武汉)seminar与会专家、学者的精彩点评,尤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研究员对于本研究提供的数据支持,文责自负。

2 黄送钦,安徽大学商学院讲师,E-mail:hsqtsinghua@163.com。

3 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E-mail:xiaobinhe@tsinghua.edu.cn。

4 高皓(通讯作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治理研究中心主任,E-mail:gaoh@pbcf.tsinghua.edu.cn。

0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些年来,中央多次公开关心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曾强调,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关心民营企业家成长”^①,并把提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当前,随着国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民营经济发展升级已迫在眉睫,如何激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创新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其中,作为影响民营企业投资决策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营商环境的优化将直接涉及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重构,已被社会各界视为突破民营企业投资瓶颈的重要方向(夏后学等,2019)。因此,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反思传统政商关系中不足、厘清新型政商关系形式,对激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助力经济创新转型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一直是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中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探究如何促进民营企业投资的研究中,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和市场发育滞后(Shleifer and Vishny, 1994),转型经济体中民营企业的投资除了受到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影响之外(Jones and Olken, 2005; Julio and Yook, 2012),往往还受到产权保护环境、资源约束等因素的影响(Acemoglu and Johnson, 2005; Xu, 2011)。而且,在市场竞争方面,政府投资或国有企业凭借其政策和资源优势在各个经济领域挤出民营企业的投资(Yonce, 2010; Cohen et al., 2011)。为此,当外部正式的制度发育滞后时,民营企业为生存发展不得不去寻找有效的替代机制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Allen et al., 2005)。在转型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在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政治联系作为一种最为典型的非市场战略(Faccio, 2006; 潘越等, 2009),在民营企业的投资发展中已发挥着重要作用(徐业坤等, 2013)。因此,如何应对政府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以便获取企业生产发展所需资源,也就成为我国民营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方面(张建君和张志学, 2005)。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转型经济期特殊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战略布局具有明显的“二元性”,企业经营管理往往受到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交织影

^① 摘录于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936009108050301&wfr=spider&for=pc)。

响,单一的市场战略难以有效地引导企业的正常运营,整合市场和非市场两种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补充内容,非市场战略主要是指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中通过改善整体行为以增加价值所采取的一致性行动,而政治战略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Baron,1995)。在诸多转型经济体中,作为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主要的非市场力量,政府掌握和控制着诸多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对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绩效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aron,1995)。其中,在对企业市场战略——投资扩能影响方面,相比于没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支出更多(Adhikari et al.,2006;蔡卫星等,2011)。一般而言,类似于企业政治行为的非市场战略运用,主要归因于在转型经济中制度缺陷以及市场的不完善等因素(Peng and Heath,1996),从而使得企业市场和非市场“二元”战略“平行”存在。而且,企业的投资除了受到来自内外部环境或资源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包括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市场环境因素的干扰,这就对企业开展非市场战略、整合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鲜有学者从战略整合的视角来讨论企业合作型非市场战略(如官员与企业家间“合作”关系)对其市场战略(如企业投资)的影响,忽视了“二元”战略互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潜在作用。

此外,就目前研究来看,现有文献所探讨的“政治联系”作为企业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其内涵界定较为抽象,均以管理者从政背景或已有社会资本等静态方式来衡量政治联系(Faccio,2006;杜兴强等,2011;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使得在分析企业在构建政治联系方面的主动性、互动性方面的认知尚且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地呈现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微观形态。实际上,随着政治资本积累和政治网络边界的拓展,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所构建的政治资本将更具有灵活性,在权变中将政治资本嵌入到企业经营活动中(赵晶和孟维炬,2016)。而且,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会积极融入政府活动中去,企业家能直接参与到政府有关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然而,从既有的文献来看,现有研究的内在逻辑阐述主要聚焦于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博弈方面,忽视了政府与企业间可能存在合作的一面,而这种合作也就构成了企业“二元”战略整合的推力。

为此,不同于以往有关政治联系视角的相关研究,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方面,系统考察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内在机理及其经济效应。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意愿和水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

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相较已有研究，本研究的可能性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现有文献在研究政企关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关系和内在机理时，过多关注的是企业在与政府利益博弈中处于被干预或者博弈劣势的立场，鲜有研究涉及政府官员与企业家间的合作关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在处于经济转型期背景下从一种战略整合的视角考察了企业家与官员合作建策对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影响，并认为合作型政治联系有助于企业战略资源的整合，这不仅丰富了企业的非市场战略研究，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战略管理，而且也为企业投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 已有研究从企业管理者从政背景、官员视察等形式来考察企业的政治关系，在其他类型政治关系，以及关系构筑中的互动行为方面尚存认知的不足。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基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的独特视角来阐述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合作型政企关系，弥补了从企业单边行为者立场来建立政治关系的局限性，丰富和优化了政企关联的度量方式。

(3) 此外，在分析企业家与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投资关系时，本文还基于企业外部资源获取、企业家地位提升以及企业内部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夯实了政企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活动中的微观中介机理，丰富了“合作型”政治联系的治理效应研究，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新时代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重要性及其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4) 最后，本文结论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对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在政府（官员）与企业间关系构建方面，我们应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企业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同党和政府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这将有助于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和实施“更接地气”、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政策方针，以便更精准地激励民营经济的实业投资热情。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的形成机理

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察“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民营企业新增

投资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主要是指企业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来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并在地方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达成某种共识,譬如成功劝说官员调整或者修改相关政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官员接受和尊重企业家的建言献策,形成了一种“政商合作”的状态。实际上,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有着其生存的“沃土”和发展的空间。本文认为,地方官员与民营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可能是地方官员“晋升压力”与民营企业“生存压力”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方面,地方经济增长导向下的官员晋升压力,催生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的机制。在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国地方形成了以政绩为考核标准的特色“晋升锦标赛”制度环境(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或官员会致力于通过促使地方企业投资来推动辖区的经济增长(Xu,2011)。出于地区间官员晋升的竞争压力,地方政府将其政治目标和社会任务转嫁于地方企业,因此企业的决策和发展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顾元媛和沈坤荣,2012)。然而,因产权性质的差异,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或影响方式在不同企业中存在明显的差异。通常来讲,由于国有控股以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我国政企分权并不彻底,地方政府能更容易对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施加影响,但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处于国有经济体系之外,在干预民营企业时所承担的成本会更高,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相对较弱(李延喜等,2015)。此时,寻找通过采取其他途径来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施加影响,可能更为适宜。

因此,除了对民营企业进行行政干预之外,如何更加有效地激励所在辖区民营企业扩大投资,一直也是地方政府付诸努力的重要方面。其中,相对于较为消极的行政干预或指令,通过与民营企业建立合作沟通渠道,可能是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施加影响的一种比较适宜的途径。在政府推崇的合作渠道引导下,将民营企业家纳入政府政策制定机制中,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以制定和执行符合民营企业发展需求的经济政策,从而间接促进民营经济扩大投资,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且,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陈钊等,2008),这也为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施加影响提供了便利。可见,在“晋升锦标赛”制度环境下,增强与民营企业沟通合作、扩大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渠道,也可能是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投资行为施加影响的一种重要机制。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成长发展的生存压力,使其具有与政府或官员合作建策的内在激励。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市场活动中存在着“基于所有权的契约歧视”,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契约环境要差于国有和外资企业(Brandt and Li,2003),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军

雄,2007)。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逐渐得到承认,但是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契约环境仍然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王永进和盛丹,2012)。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将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手段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显然,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使民营企业面临较为突出的资源困境,如何克服市场困境以获取发展所需资源,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通常来讲,由于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构建政治联系来得到政府官员支持,获取关键资源(“寻租观”),已成为诸多民营企业克服资源困境的重要手段(胡旭阳,2006;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这种非市场战略是现有文献所关注的方面。那么,除开这种寻租式的非市场策略之外,民营企业是否还存在其他渠道来谋取资源抑或者改善其资源交易的环境呢?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利用政府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民营企业企业家便可有效地参与或影响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Li et al.,2006),即通过“建言献策”方式来说服政府(官员)制定和执行符合民企发展的经济政策,为获取发展资源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Lenway and Rehbein,1991)。为此,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为突破市场交易的契约困境,通过与政府(官员)合作建言献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可能也是民营企业企业家获取发展资源、缓解生成压力的非市场战略途径。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空穴来风”,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企业家间合作建策关系的建立均有着各自依赖的利益出发点,即内生于制度环境的双方利益诉求催生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的现象。区别于已有研究所关注的“政治联系”,与政府合作建策所构建的政治联系既能呈现出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在构建政治联系方面的主动性和互动,也能表明政府与企业间可能存在合作、建立“亲”型政商关系的一面,如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进行合作、沟通和献策,这些现象却未能引起现有文献的重视。

1.2 研究假设

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诸多资源的配置权,如何处理好与政府间的关系已成为民营企业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一种特殊非市场战略,加强与政府间的密切联系、沟通,以获取政府(官员)的支持,已成为民营企业战略管理的常态,这从而也对民营企业进行市场和非市场“二元”战略的整合提出了要求。一般而言,企业投资决策受到外部环境、企业治理和企业家个人决策信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会兼顾这些因素的潜在约束和平衡其中的利弊风险。那

么,具体到本文研究的视角,作为与政府联系沟通的一个非市场战略,“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是否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产生影响,即企业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问题。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本文认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机制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产生影响。

一是外部政策环境的改善,即民营企业合作建策促进了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助于企业获取投资发展所需的资源。在与官员合作建策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最大收获可能是推动符合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需要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如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税费负担等政策,为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政策扶持。但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除了说服政府官员制定相关的显性政策之外,在与政府官员交涉过程中,民营企业不仅通过“合作建策”构筑了政治资本,而且还了解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基本态度,增强政府对企业的了解、认可和支持(戴亦一等,2015),且这些信息也将传递给其他利益相关者,能提高企业的合法性地位(Lerner,1999);了解政府政策动态信息和人事变动,精确解读政策意图(袁建国等,2015),降低企业所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企业适时调整企业战略、降低企业政治政策风险。然而,这些隐性的环境改善是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甚至这些因素对促进企业投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对民营企业而言,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政治资本的形成以及企业自身合法性地位提升,其最终落脚点在营商环境的改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投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如税收优惠、银行贷款等。为此,我们认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来提高企业创新资源的持有水平,从而来激励和促进企业进行新增投资。

二是企业家感知地位的提升,即民营企业合作建策提高了企业家政治、社会地位感知,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参与投资决策的信心。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客观地位有所提升,但受制于私有产权保护和正式交易规则的不确定性,很多民营企业对自身地位评价依旧不是很高(李春玲,2005)。通常来讲,成功劝说官员调整或者修改相关政策、与官员合作建言献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家个人身份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合法性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而言。有研究发现,高地位感知能够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种心理安全感(马骏等,2019),即高地位感知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得更为自信、具有掌控力,这种积极的心态将会促进他们进行投资决策(Anderson and Galinsky,2010)。结合已有文献的逻辑,随着与官员合作建策所带来身份地位的提升,富有安全感和自信心的企业家将更倾向采取积极的发展策略,增加企业的新增投资。为此,我们认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相对地位感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的新增投资。

三是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即民营企业合作建策促进了企业基层党建工作建设,从而优化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理论上讲,与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升伴随而来的,是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迅速推进(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理论上讲,与官员合作建言献策在提升企业家身份地位、安全感的同时,也会增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觉悟和政治信任,这种内在的驱动力将会激励企业家加强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设。而且,通过合作建策所构建的政治联系,也需要企业建立相应的部门来维系,并通过这些部门来对接和落实政府相关的经济政策,基层党组织已作为一种“统治”形式而存在(何轩和马骏,2018)。因此,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企业建立党组织已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陈仕华和卢昌荣,2014;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基层党组织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如:(1)民营企业可通过党组织来了解和掌握政府以及政策相关信息,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并以此来促进企业进行新增投资的意愿和决心;(2)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通过集体呼吁和党政呼吁途径来维护职工权益,营造良好的内部工作环境,从而为企业发展动员力量和鼓舞士气(何轩和马骏,2018)。为此,我们认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优化企业内部制度环境,如建立基层党组织、工会等,进而提高企业新增投资水平。

综上可知,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企业家与官员合作建策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具有积极影响,且其中的作用机制为:合作建策在促进企业投资问题上能实现战略资源“整合”的目的,即通过改善企业外部政策环境、提升企业家地位和信心、优化企业内部治理制度,将这些非市场资源匹配于企业投资战略的异质性需求中,从而提升民营企业的新增投资水平。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即“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促进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来源与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布平台为该调查数据正式授权发布渠道。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高质量的产出(陈光金等,2018)。本研究使用最近第12次调查数

据(2016年)进行分析。本次调查使用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民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了严格地目录抽样,在代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优度。在实际执行层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本次调查的时间点是2016年3月到4月。根据我们考察问题所涉及的相关变量,经过数据清理,得到有效样本量5184个。为避免极端值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2.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借鉴潘越等(2009)、徐业坤等(2013)设计思路,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我们设计如下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分析,如下

$$\text{invest} = \beta_0 + \beta_1 \text{cooperation} + \sum \beta_{\text{control}} \text{vav} + \sigma$$

1) 因变量:企业新增投资(invest)

针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度量,其主要对应2016年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器:(1)“2015年期间企业新增投资多少万元?”,以此数据为基础,借鉴徐业坤等(2013)以“新增投资与营业收入比例”作为企业新增投资的替代变量,且考虑到诸多样本值为0,采用tobit回归分析模型。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该题器与上述题器“新增投资的主要方向”属于附属型题器,存在主次之分,并非各自独立,因此将其作为企业新增投资的替代变量是可取、适宜的。此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以企业新增投资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新增投资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

2) 自变量:“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cooperation)

对应2016年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器为:“以下哪种说法符合您企业近两年的情况?”,其中就有“曾经成功劝说官员调整或者修改相关政策”题项,且有“符合、不符合和说不清”三个答案选项。显然,该题器反映了企业家在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建言、献策的基本概况,能很好地阐述官员善于“纳谏”、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政治现象,并有助于民营企业成长发展政策的顺利制定和实施,是衡量“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的适宜变量。为此,我们设计“‘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0-1)”哑变量cooperation。其中,倘若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企业“符合”这类情况,赋值“合作建策”为1,否则为0(其中0主要包括“不符合”和“说不清”两种情况)。

3) 控制变量

除了所考察的自变量之外,我们借鉴潘越等(2009)、徐业坤等(2013)考察,在模型中控制了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企业新增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层面、企业家个人特征和地区层面三方面因素。其一,有关企业层面的因素,我们

控制了企业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企业上市与否和企业年龄等方面的因素。其二,有关企业家个人特征方面因素,考虑到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决策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其转型方式的选择可能会受到企业家个人异质性特征因素的影响,譬如年龄、学历和性别等。为此,本研究还控制了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性别、企业家学历程度等变量。第三,有关中观层面地区因素,我们控制了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替代变量、地区创新环境和地区开放程度三个方面的地区变量。此外,在模型设计中,还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的哑变量、所在区域哑变量两方面的因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所有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采用 `stata13.0` 进行数据处理,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新增投资	新增投资与营业收入比例,详情请见“研究设计”中“因变量”部分
合作建策(0-1)	具体定义和度量方法,请见“研究设计”中“自变量”部分
企业规模	以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以净利润与企业营业收入比例/%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例/%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 2015 减去初始经营年份差额的自然对数
已上市、拟上市(0-1)	根据已上市、拟上市和未上市三个类别,设置已上市、拟上市两个哑变量。当企业为已上市或拟上市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企业主性别(0-1)	根据性别设置哑变量,若为男性,设置为 1,否则为 0
企业主年龄	调查年份 2015 减去企业主出生年份所得年数的自然对数
企业主学历(0-1)	根据是否获取学士及以上学历来设置哑变量,若获取学士学历以上,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地区人均 GDP	每个省份地区的人均 GDP,以自然对数衡量
地区创新环境	每个省份地区创新投入与财政支出间比例/%衡量
地区开放程度	每个省份地区 FDI 投资额与 GDP 间比例/%衡量,按当年美元汇率折算
行业哑变量(0-1)	此次调查企业涉及“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仓储、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商业服务、修理居民服务、科教文卫和其他类型”15 个大类行业。根据调查问卷的 15 个行业,本文设置生成 14 个行业哑变量
地区哑变量(0-1)	有关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本文借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组方式,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市)行政区;中部地区有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8 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宁夏 12 个省(市)行政区。为此,根据东、中、西三个行政区划标准,设置区域东部、中部两个哑变量;当企业位于东部或中部地区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2.3 描述性统计

表2中Panel A主要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从企业相关投资概况来看,民营企业新增投资金额占营业收入的22.37%。在“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方面,参与合作建策的企业家在此次调查中占17.59%,约占此次调查总企业数量的五分之一。在其他特征方面,我们发现有10%左右的民营企业具备上市的资格,其中已上市的企业占2%,拟上市的企业占7.85%;在资本结构方面,我们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25.6055%,整体上处于较低可控水平,但也有部分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居于110%,处于资不抵债的财务困境状态。

表2 基础统计分析

Panel A: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增投资水平	5971	0.2237	0.7713	0	6.1951
合作建策(0-1)	6755	0.1759	0.3807	0	1
企业规模	7358	5.8104	3.0427	0	12.2090
盈利能力	6590	12.2167	33.0705	-150	150
资产负债率	6198	25.6055	29.2618	0	110
企业年龄	7149	2.3489	0.8138	0	3.5553
已上市	8111	0.0200	0.1399	0	1
拟上市	8111	0.0785	0.2690	0	1
企业主性别	8067	0.7956	0.4033	0	1
企业主年龄	7974	3.7907	0.2202	3.2189	4.2047
企业主学历	7956	0.2824	0.4502	0	1
地区人均GDP	8111	10.9154	0.3992	10.1722	11.5895
地区创新环境	8111	2.4532	1.4584	0.7405	6.0356
地区开放程度	8111	0.3986	0.3583	0.0568	1.6394

Panel B: 单变量间均值差分检验					
变量名称	合作建策(0)	均值(0)	合作建策(1)	均值(1)	均值差异
新增投资水平	4298	0.2	886	0.3	-0.100***

表2中Panel B主要报告了单变量间均值差分检验结果。在企业新增投资水平上,我们发现,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家所在企业新增投资水平的均值为30%,显著高于未与官员合作建策的样本企业(均值20%)。为此,我们认为,相对而言,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家所在企业具有更强的投资意愿,其投资水平会更高。

最后,我们还对模型所采用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发现,“企业家+官

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水平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这初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还对模型变量进行膨胀因子(VIF)分析并发现,最大的膨胀因子仅为4.18,且所有变量的膨胀因子均值仅为1.66,这远低于膨胀因子的临界值(VIF=10),这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模型变量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实证分析

3.1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

表3主要报告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结果。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在未控制其他因素时,“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间呈正相关性,并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的水平,如列(1)所示。随后,在列(1)基础上还控制行业、地区等哑变量,以及企业财务特征变量后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且稳健,如列(2)~(3)所示。进一步地,在列(3)模式基础上,我们还控制了企业家个人特质、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等因素变量后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水平间呈正相关性,并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这表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强度,如列(4)~(5)所示。为此,研究假设得到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

表3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

变量名称	(1)	(2)	(3)	(4)	(5)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合作建策(0-1)	0.229*** (4.423)	0.224*** (4.358)	0.136** (2.358)	0.138** (2.356)	0.137** (2.334)
企业规模			0.019 (1.391)	0.007 (0.493)	0.009 (0.602)
盈利能力			0.005** (2.574)	0.005*** (2.592)	0.005*** (2.580)
资产负债率			0.003*** (3.052)	0.003*** (3.144)	0.003*** (3.175)
企业年龄			0.146*** (3.856)	0.217*** (4.671)	0.217*** (4.656)
已上市			0.389*** (3.384)	0.357*** (2.986)	0.346*** (2.904)

续表

变量名称	(1) 新增投资 tobit	(2) 新增投资 tobit	(3) 新增投资 tobit	(4) 新增投资 tobit	(5) 新增投资 tobit
拟上市			0.436*** (5.414)	0.414*** (5.121)	0.411*** (5.086)
企业主性别				0.123** (2.011)	0.121** (1.981)
企业主年龄				-0.319** (-2.461)	-0.312** (-2.391)
企业主学历				0.132** (2.533)	0.137*** (2.621)
地区人均GDP					-0.204* (-1.883)
地区创新环境					0.007 (0.297)
地区开放程度					0.008 (0.098)
行业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340*** (-14.178)	-0.011 (-0.171)	-0.701*** (-5.293)	0.283 (0.648)	2.386** (2.055)
sigma_cons	1.163*** (21.894)	1.147*** (22.138)	1.163*** (20.312)	1.173*** (20.234)	1.172*** (20.221)
N	5184	5184	4031	3915	3915
Log likelihood	-5626.5976	-5532.9008	-4346.5768	-4227.4439	-4225.3053
Wald $\chi^2/F(d.f.)$	19.56 (15183)	8.10 (175167)	8.03 (234008)	7.15 (263889)	6.48 (293886)
Prob> χ^2/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021	0.0187	0.0323	0.0348	0.0353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

在控制变量方面,盈利能力越强、杠杆率越高的企业,其新增投资的水平会越高。企业年龄越大,其新增投资强度越大。相对于不具有上市资格的企业而言,已上市或拟上市的民营企业其进行投资的水平会更高,这表明上市推动了企业的投资发展。在企业家个人层特征面,相对于女性企业家而言,男性企业家的所在企业的新增投资力度更大;但是年龄越大的企业家,其所在企业投资水平越低;而且,相对于大学学历以下的企业家,大学学历以上的企业家所在企业投资强度越大。此外还发现,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投资力度越小。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变量替换

表4主要呈现了变量替换下主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变量替换

变量名称	(1)	(2)	(3)	(4)	(5)
	新增投资 (与收入比)	新增投资 (与收入比)	新增投资 (自然对数)	新增投资 (自然对数)	新增投资 (自然对数)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合作建策(0-1)			0.322 [*] (1.778)		
合作建策2(0-1)	0.131 ^{**} (2.203)			0.335 [*] (1.788)	
合作建策3(0-1-2)		0.058 ^{**} (2.025)			0.154 [*] (1.7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321 (0.988)	2.387 ^{**} (2.053)	2.132 (0.547)	-2.932 (-0.660)	2.144 (0.549)
sigma_cons	1.158 ^{***} (17.682)	1.173 ^{***} (20.225)	3.788 ^{***} (58.260)	3.807 ^{***} (51.270)	3.788 ^{***} (58.313)
N	2953	3915	3914	2952	3914
Log likelihood	-3177.8727	-4226.0981	-6822.1721	-5177.9645	-6822.2632
Wald chi ² /F(d.f.)	5.09 (292924)	6.49 (293886)	79.92 (293885)	58.96 (292923)	80.03 (293885)
Prob>chi ² /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 ²	0.0384	0.0351	0.1072	0.1030	0.107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 控制变量同表3。

其一,替换自变量“合作建策”的度量方式,其他变量不变。一是在原基础数据上,我们直接剔除样本中存在“说不清”的样本值,生成新的“合作建策2(0-1)”变量,此时1表示为“符合”选项,0表示为“不符合”选项。研究发现,如列(1)所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水平间呈正相关性,并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上文所得结论依然稳健。二是在原基础数据上形成一个程度变量(0、1和2),其中有关“说不清”这个选项,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为被调查者的所在企业处于“符合与不符合”两个状态之间,0、1和2分别对应

“不符合”“说不清”和“符合”三种类型,即“合作建策3”的数值越大,则表示“曾经成功劝说官员调整或者修改相关政策”这种说法越符合企业现实的情况。研究发现,如列(2)所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水平间呈正相关性,并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上文所得结论依然稳健。

其二,因变量企业新增投资水平的替换,在这里我们以企业新增投资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新增投资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如 $\ln(\text{新增投资}+1)$,其他变量不变。为此,如中列(3)~(5)所示,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本文所设计的三个不同自变量——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水平(以自然对数衡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得结论的稳健性。

3.2.2 内生性问题

前文分析认为,“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意愿和投资水平。但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政府产业政策的布局、官员与企业家间的非正式沟通关系的形成是有律可循的。其中,企业扩大投资可能被视为地方政府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甚至构建政治联系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具体到本文研究主题,新增投资水平越高的企业,这类企业家越可能会被地方政府吸纳参政议政,参与政策制定,以增强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合作。显然,“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内生性问题。

为此,为剔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地方主政官员变更作为冲击展开进一步考察。其次,使用地方财政赤字状况作为工具变量,采用Heckman检验以解决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PSM)的多种匹配方法来减轻其中的内生性问题。

1) 官员变更的政治冲击

政商之间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情景边界的,当所在地区的主政官员发生变更时,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将面临一种外部冲击。有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更替不仅可能会使企业原有围绕原有官员的政企联盟关系发生中断风险(潘越等,2015),而且还会造成前后届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当地企业面临相应的政策风险(罗党论等,2016)。为此,本部分将利用企业所在地区主政官员变更作为冲击,检验政治冲击对“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新增投资间关系的影响。其中,本文有关“主政官员变更”主要是指2015年间企业所市级地区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变更情况,官员变更数据从中经网地方党政领导人库、人民网等相关权威网络媒体基础上,通过手工整理所得,其具体的设计方法主要借鉴罗党论等(2016)度量方式,如倘若2015年企业所在市级地区的市长或市委书记发生变更,则赋值官员变量change为1,否则为0。为有效检验我们预期观点,引入调节变量(官

员变更),并设计了如下模型:

$$\text{invest} = \chi_0 + \chi_1 \text{cooperation} + \chi_2 \text{cooperation} \times \text{change} + \chi_3 \text{change} + \sum \chi \text{control} v + v$$

经分析后发现,如表5所示,官员变更对企业新增投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官员变更降低了企业新增投资水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交叉项(合作建策×官员变更)与企业新增投资水平间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地方主政官员变更对官商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中的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根据官员变更划分两类样本后发现,官商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积极作用仅在未发生官员变更的地区样本中存在,而在发生官员变更的样本中,官商合作建策未能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

表5 内生性问题:地方官员变更的冲击

变量名称	(1) 新增投资 官员变更	(2) 新增投资 官员变更=1	(3) 新增投资 官员变更=0	(4) 新增投资 市长变更	(5) 新增投资 书记变更
合作建策(0-1)	0.134** (2.295)	-0.002 (-0.013)	0.170*** (2.628)	0.151** (2.460)	0.146** (2.389)
合作建策×官员变更	-0.254* (-1.658)				
官员变更	-0.108* (-1.682)				
合作建策×市长变更				-0.219 (-1.150)	
市长变更				-0.093 (-1.164)	
合作建策×书记变更					-0.428** (-2.093)
书记变更					-0.200** (-2.4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028* (1.680)	1.856 (0.470)	1.958 (1.497)	2.161* (1.727)	2.127* (1.745)
sigma_cons	1.171*** (20.265)	1.097*** (7.014)	1.177*** (19.116)	1.181*** (20.040)	1.179*** (20.065)
N	3915	577	3338	3792	3792
Log likelihood	-4222.8515	-539.55977	-3667.873	-4092.6213	-4089.1757

续表

变量名称	(1) 新增投资 官员变更	(2) 新增投资 官员变更=1	(3) 新增投资 官员变更=0	(4) 新增投资 市长变更	(5) 新增投资 书记变更
Wald $\chi^2/F(d.f.)$	6.08 (313884)	1.83 (29548)	5.54 (293309)	5.93 (313761)	5.95 (313761)
Prob> χ^2/F	0.000	0.0057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359	0.0646	0.0342	0.0357	0.0366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控制变量同表 3。

最后,我们还对官员变更进行了划分,区分为市长变更、市委书记变更两个哑变量,对上述问题重新检验。经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委书记变更对官商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积极作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市长变更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却不显著。上述结论表明,作为地方市级地区的最为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相对于市长变更而言,市委书记变更对官商合作建策在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中积极作用的影响更大。之所以会产生其中的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在我国,党领导一切,市委书记的权力大于市长,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晋升体制下,市委书记才是负责管理地方党政要务的“一把手”,地区诸多重大经济政策均受到市委书记的影响会更大,市委书记的变更将对地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官商合作建策不再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经常发生主政官员变更的市级地区企业新增投资水平低下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即官员变更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民营新增投资水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2) 自选择问题(Heckman 模型)

在本部分,通过寻找合作建策的工具变量,减弱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所产生的干扰,且本部分主要参考赵晶和孟维烜(2016)采用 Heckman 模型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理论上讲,满意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与扰动项不相关”“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两个重要条件。通常来讲,官员吸纳企业家良策、增强和企业家的联系与官员所面临的晋升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晋升压力往往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压力方面。当官员面临较大的晋升压力时,他们会存在很强的激励去发展地方经济、支持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甚至善于接纳地方企业家有关经济发展的“建言良策”。同时,地方官员晋升压力中的地方财政赤字状况似乎与所在地区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即财政赤字状况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工具变量。为此,借鉴赵晶和孟维烜(2016)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且均为来自 2015 年各省级层面的统计年检数据。

为此,在第一阶段 probit 模型分析中,除了引入工具变量财政赤字状况之外,我们控制了可能影响合作建策的影响因素,如:企业特征因素: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企业上市与否和企业年龄等方面的因素;企业家个人特征因素,如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性别、企业家学历程度和政企关联等变量;地区中观层面地区因素,如地区经济人均 GDP、地区创新环境和地区开放程度等变量。此外,在模型设计中,我们还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的哑变量、所在区域哑变量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阶段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赤字状况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官员晋升压力越大,此时地方官员越可能会接纳地方企业家有关经济发展的“建言良策”,如表 6 列(1)所示。在第二阶段 tobit 回归分析中,结果分析显示,逆米尔斯比率(IM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此时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稳健。

表 6 样本自选择问题(Heckman)

变量名称	(1)	(2)
	合作建策(0-1) probit	新增投资 tobit
合作建策(0-1)		0.124** (2.108)
地方财政赤字状况	0.121** (2.540)	
逆米尔斯比率(IMR)		-1.078*** (-3.6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_cons	-4.152*** (-2.896)	5.618*** (3.828)
sigma_cons		1.169*** (20.217)
N	4204	3915
Log likelihood	-1865.623	-4217.7459
Wald chi ² /F(d.f.)	92.56 (30)	6.50 (303885)
Prob>chi ² /F	0.000	0.000
Pseudo R ²	0.0252	0.0370

注:* $p<0.1$, ** $p<0.05$, *** $p<0.01$,括号内为 t 值;除了第一阶段还引入“政治联系”之外,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3。

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PSM)

本文接下来根据“企业家+官员”是否产生合作建策(0-1)情况,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估计方法来分析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如表7所示,经验证表明,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差偏差小于10%,且所有 t 值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对比匹配前的结果,所有变量的标准差偏差均大幅度缩小,说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为此,首先通过近邻匹配(1:2)后发现,近邻匹配(1:2)效果良好(如表8所示),且经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基础回归而言,虽然此时合作建策(0-1)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有所变化,但估计系数依然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结论相一致,如表9列(1)所示。此外,我们还分别进行了最近邻匹配(1:4)、卡尺内(1:4)匹配、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估计所得“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结论与上文基本一致,如表7至9所示。这说明以上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7 匹配效果的检测

Panel A						
变量名称	匹配前后	处理组	控制组	%bias	t 值	p 值
企业规模	U	6.443	6.2877	5.7	1.36	0.175
	M	6.4452	6.4752	-1.1	-0.20	0.844
盈利能力	U	17.874	11.472	18.6	4.54	0.000
	M	17.67	16.462	3.5	0.63	0.526
资产负债率	U	25.169	27.528	-8.3	-1.90	0.058
	M	25.080	24.612	1.6	0.31	0.760
企业年龄	U	2.4558	2.3687	11.0	2.57	0.010
	M	2.4559	2.4383	2.2	0.40	0.687
已上市	U	0.0262	0.0181	5.5	1.37	0.170
	M	0.0262	0.0301	-2.6	-0.42	0.675
拟上市	U	0.1079	0.0854	7.6	1.83	0.067
	M	0.1065	0.1080	-0.5	-0.09	0.929
企业主学历	U	0.3097	0.2912	4.0	0.95	0.344
	M	0.3102	0.3194	-2.0	-0.36	0.720
企业主性别	U	0.8089	0.8105	-0.4	-0.09	0.927
	M	0.8086	0.8094	-0.2	-0.04	0.972
企业主年龄	U	3.8026	3.7891	6.3	1.47	0.142
	M	3.8029	3.8027	0.1	0.01	0.991
地区人均GDP	U	10.924	10.952	-7.1	-1.61	0.107
	M	10.924	10.901	6.0	1.10	0.270
地区创新环境	U	2.3877	2.5228	-9.5	-2.18	0.029
	M	2.3894	2.3358	3.8	0.69	0.488
地区开放程度	U	0.3822	0.4135	-9.0	-2.05	0.041
	M	0.3825	0.3834	-0.2	-0.04	0.964

续表

Panel B								
Sample	Ps R^2	LR χ^2	$p > \chi^2$	MeanBias	MedBias	B	R	%Var
Unmatched	0.022	77.36	0.000	6.4	6.0	37.8*	1.03	12
Matched	0.007	12.62	0.994	2.7	2.3	19.7	1.17	12

表8 匹配结果检验

Panel A: 近邻匹配(1:2)					
Sample	Treated	Controls	Difference	S. E.	T-stat
Unmatched	0.3050	0.2079	0.0972	0.0341	2.85
ATT	0.3055	0.2153	0.0902	0.0458	1.97
Panel B: 近邻匹配(1:4)					
Sample	Treated	Controls	Difference	S. E.	T-stat
Unmatched	0.3050	0.2079	0.0972	0.0341	2.85
ATT	0.3055	0.1845	0.1211	0.0426	2.84
Panel C: 卡尺内匹配(1:4)					
Sample	Treated	Controls	Difference	S. E.	T-stat
Unmatched	0.3050	0.2079	0.0972	0.0341	2.85
ATT	0.3055	0.1860	0.1195	0.0427	2.80
Panel D: 半径(卡尺)匹配					
Sample	Treated	Controls	Difference	S. E.	T-stat
Unmatched	0.3050	0.2079	0.0972	0.0341	2.85
ATT	0.3055	0.2214	0.0841	0.0410	2.05
Panel E: 核匹配					
Sample	Treated	Controls	Difference	S. E.	T-stat
Unmatched	0.3050	0.2079	0.0972	0.0341	2.85
ATT	0.3055	0.2120	0.0935	0.0406	2.30

表9 匹配后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5)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合作建策(0-1)	0.111* (1.652)	0.166*** (2.722)	0.166*** (2.722)	0.139** (2.366)	0.139** (2.3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104 (0.598)	0.606 (0.417)	0.606 (0.417)	2.303** (1.982)	2.303** (1.982)

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5)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sigma_cons	1.153*** (14.568)	1.111*** (15.481)	1.111*** (15.481)	1.172*** (20.200)	1.172*** (20.200)
N	1668	2352	2352	3906	3906
Log likelihood	-1845.6847	-2501.3612	-2501.3612	-4217.9752	-4217.9752
Wald $\chi^2/F(d.f.)$	3.32 (291639)	4.58 (292323)	4.58 (292323)	6.49 (293877)	6.49 (293877)
Prob> χ^2/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517	0.0450	0.0450	0.0356	0.0356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控制变量同表 3。

4 中介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意愿和水平。根据上文两者间的逻辑阐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主要通过企业外部层面（资源获取效应）、企业家层面（地位提升效应）和企业内部层面（企业制度建设效应）三个中介机制来发挥其在激励企业投资中的积极作用。

4.1 中介变量界定及其均值差分比较

首先，在资源获取效应方面。银行授信是企业获取稳定、持续的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企业的投资发展尤为重要（马光荣等，2014）。考虑到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且融资已成为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财务战略。在这里，将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视角来考察合作建策的资源获取效应，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融资、小型金融机构融资两个方面，这分别对应于2016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题器为：2015年底，您的企业资金接待状况？（1）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总额是多少万元？（2）小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贷款总额是多少万元？并借鉴马光荣等（2014）变量设计思路，银行贷款均以融资金额与营业收入比例（%）作为变量的度量方法。

其次，在地位提升效应方面。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客观地位有所提升，但受制于私有产权保护和正式交易规则的不确定性，很多民营企业对自身地位评价依旧不是很高（李春玲，2005）。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对“自身地位”的判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并由此来影响其所在企业的战略指导和投资决策（马骏等，2019）。为此，借鉴马骏等（2019）的研究，我们将以企业家身

份地位视角来考察地位提升效应,主要包括企业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三个方面,所对应于2016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题器为: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人士)相比,您认为自己在下列三种社会阶梯上处于在何种位置: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且每个选项是一个程度度量变量(1表示最高,到10表示最低),即数值越大,相应的地位越低。

最后,在内部制度建设效应方面。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企业建立党组织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陈仕华和卢昌荣,2014;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已有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存在(何轩和马骏,2018),在引导、监督、维权、统战、协调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对企业内部治理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陈仕华和卢昌荣,201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层党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考虑到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均未具备上市的资格,且尚未建立成熟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本部分我们将从企业基层组织建设角度来分析合作建策带来的制度建设效应,这对应2016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问题:在您的企业中,有无下列机构?其中包括“中共党组织、工会、共青团组织”三类基层组织,分别来设置三个哑变量(0-1),1表示设立组织,0表示未设立组织。

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之前,我们根据合作建策(0-1)变量对单变量间均值差分进行了检验,如表10所示。在获取融资资源方面,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家所在企业获得的融资水平,要显著高于未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这表明与官员合作建策能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政策福利,获取更多商业贷款资源。在企业家地位提升方面,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家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均显著高于未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家地位,这表明与官员合作建策能提升企业家的地位感知。在企业内部制度建设方面,相对于未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与官员合作建策的企业家所在企业更可能会致力于基层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等内部制度的建设。

表10 中介变量的均值差异比较分析

变量名称	合作建策(0)	均值(0)	合作建策(1)	均值(1)	均值差异
商业银行融资	4261	27.64	902	32.441	-4.801
小型金融机构融资	3871	3.304	817	5.309	-2.005***
社会地位	5270	6.909	1111	6.505	0.404***
政治地位	5223	7.548	1093	6.959	0.590***
经济地位	5298	6.918	1112	6.606	0.312***
党组织建设	4538	0.275	1057	0.322	-0.047***
工会组织建设	4537	0.346	1057	0.38	-0.034**
共青团组织建设	4536	0.113	1057	0.15	-0.037***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4.2 中介效应实证检验

下面部分,借鉴温忠麟等(2005)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将从资源获取效应、地位提升效应和内部制度效应三个方面来研究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新增投资行为的中介路径。

4.2.1 资源获取效应:金融资源的获取

如表 11 所示,通过实证分析可知,“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商业银行贷款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这表明与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提高了民营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融资的规模。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商业银行贷款均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商业银行融资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在小型金融机构融资方面,“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小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这表明与政府官员合作建策提高了民营企业从小型金融机构中获取贷款融资的规模。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小型金融机构贷款均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小型金融机构融资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

表 11 中介效应分析:资源获取效应方面

变量名称	(1)	(2)	(3)	(4)
	商业银行融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小型金融机构融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合作建策(0-1)	19.454 ** (2.333)	0.106 * (1.776)	13.192 ** (2.017)	0.115 * (1.736)
商业银行融资		0.004 *** (7.559)		
小型金融机构融资				0.005 *** (2.8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05.774 (1.194)	1.929 * (1.659)	4.465 (0.031)	3.091 ** (2.432)
sigma_cons	155.993 *** (20.890)	1.124 *** (19.895)	84.120 *** (17.839)	1.200 *** (19.014)
N	3919	3688	3584	3402
Log likelihood	-11573.031	-3878.5491	-2621.177	-3666.2981

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商业银行融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小型金融机构融资 tobit	新增投资 tobit
Wald $\chi^2/F(d.f.)$	14.03 (293890)	7.76 (303658)	4.74 (293555)	5.79 (303372)
Prob> χ^2/F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280	0.0693	0.0247	0.0390

注：* $p<0.1$ ，** $p<0.05$ ，*** $p<0.01$ ，括号内为 t 值；控制变量同表3。

上述结论表明，融资资源获取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因子，即与地方政府官员合作建策渠道能帮助民营企业积极与政府沟通、反映企业发展融资困境，有助于民营经济利好政策的制定，如破除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金融政策，最终通过缓解融资困境影响了企业新增投资决策。

4.2.2 地位效应：企业家身份地位的提升

如表12所示，通过实证分析可知，“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家经济地位间呈显著负相关性，这表明与地方政府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提高了民营企业的经济地位。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济地位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经济地位提升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此外还发现，上述企业家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在企业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方面也同样存在，这表明企业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提升也均是“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

表12 中介效应分析：企业家地位提升效应方面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经济地位 ologit	新增投资 tobit	社会地位 ologit	新增投资 tobit	政治地位 ologit	新增投资 tobit
合作建策(0-1)	-0.188** (-2.392)	0.126** (2.107)	-0.370*** (-4.774)	0.114* (1.901)	-0.410*** (-5.441)	0.115* (1.889)
经济地位		-0.035** (-2.398)				
社会地位				-0.065*** (-4.542)		
政治地位						-0.032** (-2.574)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经济地位 ologit	新增投资 tobit	社会地位 ologit	新增投资 tobit	政治地位 ologit	新增投资 tobit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3.222*** (2.653)		3.450*** (2.860)		3.271*** (2.687)
cut_cons	省略		省略		省略	
sigma_cons		1.173*** (20.124)		1.167*** (20.061)		1.170*** (20.033)
N	4056	3791	4045	3782	4015	3758
Log likelihood	-7584.4493	-4104.7633	-7657.9805	-4084.3679	-8084.2843	-4071.5666
Wald $\chi^2/F(d.f.)$	906.67 (29)	6.16 (303761)	822.28 (29)	6.23 (303752)	785.74 (29)	6.03 (30,3728)
Prob> χ^2/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625	0.0368	0.0548	0.0386	0.0483	0.0366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控制变量同表 3。

上述结论表明，民营企业地位的提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因子。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合法性问题的一直存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诸多困境，这就导致民营企业群体在社会上的影响存在乏力的特点。此时，与地方政府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则可能被视为提升民营企业和企业声誉、地位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合作建策不仅能向外界传递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构建或维系与政府的政治联系，从而提升了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而这种地位合法性的提升增强了民营企业和企业从事投资信心，降低了企业经营决策所面临的政策风险，从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

4.2.3 制度效应：内部制度建设

如表 13 所示，通过实证分析可知，“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基层党组织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这表明与地方政府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有助于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党组织建设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建立基层党组织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此外，在以工会、共青团作为企业内部党建制度的替代变量时，上述中介效应也均存在，这表明以工会、共青团组织为基础的制度环境优化也均是“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影响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

表13 中介效应分析:企业内部制度建设效应方面

变量名称	(1) 党组织建设 logit	(2) 新增投资 tobit	(3) 工会组织建设 logit	(4) 新增投资 tobit	(5) 共青团组织建设 logit	(6) 新增投资 tobit
合作建策(0-1)	0.315*** (2.660)	0.100* (1.656)	0.348*** (3.053)	0.097 (1.616)	0.285** (2.057)	0.107* (1.784)
党组织建设		0.244*** (4.308)				
工会组织建设				0.282*** (4.945)		
共青团组织建设						0.156** (2.4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9.735*** (-3.819)	1.989* (1.647)	-7.455*** (-2.985)	2.047* (1.700)	-6.794** (-2.048)	1.825 (1.513)
sigma_cons		1.122*** (18.995)		1.120*** (19.034)		1.125*** (19.010)
N	3631	3386	3630	3385	3631	3386
Log likelihood	-1632.1222	-3704.6746	-1726.0786	-3699.5451	-1130.0662	-3712.2041
Wald chi ² /F(d.f.)	746.99 (29)	5.67 (303356)	776.61 (29)	5.64 (303355)	426.27 (29)	5.37 (303356)
Prob>chi ² /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 ²	0.2793	0.0403	0.2904	0.0414	0.1879	0.038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 控制变量同表 3。

上述结论表明,民营企业内部制度建设是“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中介因子。与官员合作建言献策能增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觉悟和政治信任,这种内在的驱动力将会激励企业家加强企业内部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设。一般来讲,民营企业通过党组织与地方党政间政治联系来了解和掌握与企业相关的政策信息,并以此来促进企业进行新增投资的意愿和决心;而且,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通过集体呼吁和党政呼吁途径营造良好的内部工作制度环境,从而为企业投资发展动员力量和鼓舞士气。同样地,被视为党和政府职能在企业内部的一种延伸,企业工会组织往往会肩负着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企业发展的责任,通过维护职工权益来营造良好的内部组织环境,进而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新增投资。

5 进一步分析

5.1 异质性特征影响分析

表 14 主要报告了不同异质性因素影响下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表 14 异质性特征影响分析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7)	(8)
	市场化程度高低		政企关联		地方优惠政策		国家优惠政策	
	1	0	1	0	1	0	1	0
合作建策(0-1)	0.059 (0.856)	0.270*** (2.746)	0.106 (1.325)	0.142* (1.684)	-0.084 (-1.068)	0.252** (2.514)	0.040 (0.539)	0.231** (2.2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4.484** (2.061)	3.650** (2.193)	-1.497 (-0.789)	4.672*** (3.132)	3.134 (1.546)	1.753 (1.248)	2.840 (1.584)	2.526* (1.655)
sigma_cons	1.021*** (13.334)	1.339*** (15.564)	0.927*** (11.258)	1.299*** (16.930)	1.171*** (14.172)	1.151*** (14.593)	1.163*** (14.957)	1.170*** (13.780)
N	2126	1789	1110	2805	1328	2559	1810	2072
Log likelihood	-2190.851	-1975.278	-1299.964	-2833.845	-1613.511	-2542.282	-2056.412	-2114.667
Wald chi ² / F(d.f.)	3.60 (292097)	3.46 (291760)	1.66 (291081)	4.99 (292776)	2.68 (291299)	4.61 (292530)	3.35 (291781)	3.90 (292043)
Prob>chi ² /F	0.000	0.000	0.01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 ²	0.0446	0.0378	0.0313	0.0400	0.0357	0.0366	0.0436	0.0337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控制变量同表 3。

其一，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针对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本文主要引用王小鲁等(2016)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作为数据基础，并以指数的中位数来划分高市场化地区和低市场化地区两个样本，倘若所在地区市场化指数高于或等于中位数，则称其处于高市场化地区，否则为低市场化地区。分析发现，“企业家+官员”成功实现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仅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中存在，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中不存在，其中产生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相对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中，政府在地区经济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经济活动中政府行政干预较多，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具有晋升激励的政府政策难以有效解决地区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此时企业家迫切参与制定利于自身发展的地方经济政策的内在激励

较强,从而导致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其二,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针对政治关联,本文以学界较为成熟通用的方法,即民营企业主是否担任现任或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如若符合情况,则赋值政治联系为1,否则为0。分析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仅在未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中存在,而在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中不存在,其中产生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相对未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政治联系的企业中,企业能通过政治关联对政府官员进行寻租,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优惠政策等,以服务于企业投资发展,此时企业家参与制定利于自身发展的地方经济政策的内在激励较弱,从而导致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不够明显,而这种情况在未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却完全相反。

其三,政府优惠政策的影响。政府优惠政策变量对应于2016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题器:以下哪种说法符合您企业近两年的情况?其中选项包括“当地政府给了本企业很多特殊优惠和资金支持”“比较充分享受了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且有“符合”“不符合”和“说不清”三个答案选项。为此,倘若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企业“符合”这类情况,我们赋值变量“政府优惠政策”为1,否则为0(其中0主要包括“不符合”和“说不清”两种情况)。分析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仅在地方政府未给予优惠政策、未充分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企业中存在,而在其他企业中不存在。显然,该结论进一步凸显了“合作建策”在促进企业投资中的积极作用。与地方官员合作建策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成功说服了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这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明显的激励促进作用,但是在已经得到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或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企业下,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发展中所产生的这种边际效应会减弱。

5.2 合作建策的优化政商环境效应

从前文分析可以得知,企业家与官员合作建策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新增投资水平,显然这是从企业经营(即企业家利益)的视角来展开的,但是既然是以一种“合作”关系来开展建策,那说明这种合作关系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因此,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来看,合作建策不仅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而且还有助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具体到本文主题上,这里的政府行政效率提升主要侧重于优化地区政商环境方面。

其中,针对政府行政效率变量的设计,本文选取基础数据来源于2016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别从企业近两年来为办成事是否找关系、跟官员打招呼,是否需要给官员送礼,以及政府官员是否存在“懒政”“不作为”情况等三个方面来衡量政府行政效率,其中每个题器的选择项为1~4,数值越小,企业办事情所

面临的政务环境越好,即政府行政效率越高。考虑到政商环境的优化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往往表现在中观地区层面,在这里我们将以市级地区企业家参与合作建策状况对市级地区政府行政效率进行回归,来验证企业家参政议政对地区整体政务环境的影响^①。其中,市级地区企业家参与合作建策,是以本次调查中“当地企业家参与合作建策的企业比例”进行度量;市级地区政府行政效率,是分别以本次调查中“办成事是否找关系、跟官员打招呼,是否需要给官员送礼,以及政府官员是否存在‘懒政’‘不作为’情况等三个方面市级层面企业均值来衡量政府行政效率”。

表 15 从地区层面角度分析了合作建策在优化“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环境中的作用。经分析发现,地区合作建策与地区企业办事找关系、办事是否送礼、是否存在官员懒政行为间呈显著负相关性,这表明地区“官员与企业家”合作建策的环境越好,企业去政府办事情时更可能不需要找关系、不要跟官员打招呼,不需要给官员送礼,以及官员存在“懒政”“不作为”情况越少,即政府行政效率越好。上述结论表明,企业家与官员合作建策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优化政商环境,从而提高了企业所面临的政务服务质量,增强了政府职能的服务能力。

表 15 合作建策的优化政商环境效应

变量名称	(1)	(2)	(3)
	办事找关系	办事送礼	官员懒政
合作建策	-0.174 *** (-2.991)	-0.161 ** (-2.525)	-0.119 *** (-2.7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4392	4292	4225
<i>F</i> (d. f.)	33.49 (294362)	20.99 (294262)	21.77 (294195)
Prob> <i>F</i>	0.000	0.000	0.000
<i>R</i> ²	0.133	0.087	0.094
adj. <i>R</i> ²	0.127	0.080	0.088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 控制变量同表 3。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董志强等,

^① 作者感谢审稿专家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即从市级地区层面来考察合作建策的政商环境优化作用。

2012)。作为改革创新的表现形式,优化营商环境是打破行政性垄断,激发市场创造力和活力的重要战略方案(夏后学等,2019)。具体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在于:如何构建良性的政府与企业间关系,即政商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这对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具体到实践活动中,面临较为复杂且系统的政商关系网或环境,如何在政府与企业间的行为关系中寻找一种合适状态或互动机制,来推进良好政商关系的构建和发展,是我们新时代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

区别已有文献,本文基于政商“合作建策”的独特视角,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实证分析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意愿和水平,且其对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本文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对企业战略谋划来讲,在与政府(官员)积极沟通、交流活动中,通过捕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信息、利用潜在的政治资源,实现非市场与市场“二元”战略的整合,以突破制度设计和资源的约束,这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开展尤为重要。而着眼国家市场化改革来讲,增强政府与民营企业间沟通、交流,构建合作型的政商关系,有利于民营企业投资发展,这一方面为新时代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为当前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投资激励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根据本文结论认为,面临制度缺陷带来的发展困境,非市场战略已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进行“二元”战略资源整合将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方向。同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同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共商地方事宜”将有助于激励民营经济的投资发展。此外,政策是影响民营企业技术投资最重要的外在大力量之一,政府应继续推进相关优惠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针对民营企业投资活动,应制定普惠金融、投资补贴和降税费等政策,提高企业投资发展的资源禀赋水平。进一步地,作为企业投资发展最为重要的决策者,社会或政府部门应积极营造尊重民营企业家的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地位感知,以增强民营企业企业家推进投资发展的内在动力。最后,根据各自企业的特征或需要,推进民

营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的建设,以营商良好的内部制度环境,服务于企业投资发展。

参考文献

- 蔡卫星,赵峰,曾诚. 2011. 政治关系、地区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行为[J]. 金融研究,(4): 100-112.
- Cai W X, Zhao F, Zeng C. 2011. Political connec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irm investment behavior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4): 100-112. (in Chinese)
- 陈光金,吕鹏,林泽炎,等. 2018.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25周年:现状与展望[J]. 南开管理评论,21(6): 17-27.
- Chen G J, Lü P, Lin Z Y, et al. 2018. The 25 years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Points and prospects [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1(6): 17-27. (in Chinese)
- 陈仕华,卢昌崇. 2014.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 [J]. 管理世界,(5): 106-120.
- Chen S H, Lu C C. 2014. Can the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curb the “loss of state asset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 *Management World*, (5): 106-120. (in Chinese)
- 陈钊,陆铭,何俊志. 2008. 权势与企业家参政议政[J]. 世界经济,31(6): 39-49.
- Chen Z, Lu M, He J Z. 2008. Power and entrepreneuri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31(6): 39-49. (in Chinese)
- 戴亦一,洪群,潘越. 2015. 官员视察、媒体关注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37(7): 13-25.
- Dai Y Y, Hong Q, Pan Y. 2015. Official inspections, media attention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J]. *Economic Management*, 37(7): 13-25. (in Chinese)
-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2012.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4): 9-20.
- Dong Z Q, Wei X H, Tang C Q. 2012. Institutional soft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30 major cities [J]. *Management World*, (4): 9-20. (in Chinese)
- 董志强,魏下海. 2018. 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积极作用——以职工权益保护为例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动态,(1): 14-26.
- Dong Z Q, Wei X H. 2018. The activ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J]. *Dynamics of Economics*, (1): 14-26. (in Chinese)
- 杜兴强, 曾泉, 杜颖洁. 2011. 政治联系、过度投资与公司价值——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8): 93-110.
- Du X Q, Zeng Q, Du Y J. 2011. Political connections, over-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ate-owned public listed compan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8): 93-110. (in Chinese)
- 方军雄. 2007. 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J]. *经济研究*, 42(12): 82-92.
- Fang J X. 2007.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pital alloc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2(12): 82-92. (in Chinese)
- 顾元媛, 沈坤荣. 2012. 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10): 77-88.
- Gu Y Y, Shen K R. 2012. Th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10): 77-88. (in Chinese)
- 何轩, 马骏. 2018. 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33(3): 1-24, 242.
- He X, Ma J. 2018. Dos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J]. *Sociological Studies*, 33(3): 1-24, 242. (in Chinese)
- 胡旭阳. 2006.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 *管理世界*, (5): 107-113, 141.
- Hu X Y. 2006. Th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ir financing facilities [J]. *Management World*, (5): 107-113, 141. (in Chinese)
- 李春玲. 2005.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J]. *社会学研究*, (2): 74-102.
- Li C L. 2005. Prestige stratif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Occupational prestige measures and socio-economic index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 74-102. (in Chinese)
- 李延喜, 曾伟强, 马壮, 等. 2015. 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J]. *南开管理评论*, 18(1): 25-36.
- Li Y X, Zeng W Q, Ma Z, et al. 2015.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wnership and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nies' investment [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18(1): 25-36. (in Chinese)
- 罗党论, 刘晓龙. 2009. 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5): 97-106.

- Luo D L, Liu X L. 2009. Political ties, barriers to entry and firm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5): 97-106. (in Chinese)
- 罗党论, 应千伟. 2012. 政企关系、官员视察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15(5): 74-83.
- Luo D L, Ying Q W. 2012. Political connection, official inspec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com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15(5): 74-83. (in Chinese)
- 罗党论, 廖俊平, 王珏. 2016.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51(5): 130-142.
- Luo D L, Liao J P, Wang J. 2016. Local officials, turnover and corporate risk—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1(5): 130-142. (in Chinese)
- 马光荣, 刘明, 杨恩艳. 2014. 银行授信、信贷紧缩与企业研发[J]. *金融研究*, (7): 76-93.
- Ma G R, Liu M, Yang E Y. 2014. Bank lines of credit, credit squeeze and firm R&D[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7): 76-93. (in Chinese)
- 马骏, 罗衡军, 肖宵. 2019.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企业创新投入[J]. *南开管理评论*, 22(2): 144-156.
- Ma J, Luo H J, Xiao X. 2019. Status percep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 and firm innovation input[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2(2): 144-156. (in Chinese)
- 潘越, 戴亦一, 吴超鹏, 等. 2009. 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决策[J]. *经济研究*, 44(11): 82-94.
- Pan Y, Dai Y Y, Wu C P, et al. 2009.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decis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4(11): 82-94. (in Chinese)
- 潘越, 宁博, 肖金利. 2015.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6): 135-147.
- Pan Y, Ning B, Xiao J L. 2015. Local political power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Evidence from local officials' turnover and executives' change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6): 135-147. (in Chinese)
- 王小鲁, 余静文, 樊纲. 2016. 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J]. *财经*, (11).
- Wang X L, Yu J W, Fan G. 2016. Report on the eight-year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in China[J]. *Caijing*, (11). (in Chinese)
- 王永进, 盛丹. 2012. 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J]. *经济学(季刊)*, 11(4): 1193-1218.

- Wang Y J, Sheng D. 2012.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s (Quarterly)*, 11(4): 1193-1218. (in Chinese)
-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37(2): 268-274.
- Wen Z L, Hou J T, Zhang L. 2005. A comparison of moderator and mediator and their applications[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7(2): 268-274. (in Chinese)
-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2019.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4): 84-98.
- Xia H X, Tan Q M, Bai J H. 2019.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erprise rent-seeking and market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enterprise survey[J]. *Economic Research*, (4): 84-98. (in Chinese)
- 徐业坤, 钱先航, 李维安. 2013.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 (5): 116-130.
- Xu Y K, Qian X H, Li W A. 2013. Political uncertainty,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turnover of municipal party secretaries[J]. *Management World*, (5): 116-130. (in Chinese)
- 余明桂, 潘红波. 2008.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 (8): 9-21, 39.
- Yu M G, Pan H B.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ccess to bank loans[J]. *Management World*, (8): 9-21, 39. (in Chinese)
- 于文超, 何勤英. 2013. 投资者保护、政治联系与资本配置效率[J]. *金融研究*, (5): 152-166.
- Yu W C, He Q Y. 2013. Investor protec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J]. *Financial Studies*, (5): 152-166. (in Chinese)
- 袁建国, 后青松, 程晨. 2015. 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J]. *管理世界*, (1): 139-155.
- Yuan J G, Hou Q S, Cheng C. 2015. The curse effect of corporate political resource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Management World*, (1): 139-155. (in Chinese)
- 张建君, 张志学. 2005.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 (7): 94-105.
- Zhang J J, Zhang Z X. 2005.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the entrepreneur in private corporate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7): 94-105. (in Chinese)
- 赵晶, 孟维炬. 2016. 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9): 109-126.

- Zhao J, Meng W X. 2016. Impact of official inspection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9): 109-126. (in Chinese)
- 周黎安. 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42(7): 36-50.
- Zhou L A. 2007.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2(7): 36-50. (in Chinese)
- Acemoglu D, Johnson S. 2005.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5): 949-995.
- Adhikari A, Derashid C, Zhang H. 2006.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25(5): 574-595.
- Allen F, Qian J, Qian M. 2005.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1): 57-116.
- Anderson C, Galinsky A D. 2006. Power,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4): 511-536.
- Baron D P. 1995. Integrated strategy: 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onents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7(2): 47-65.
- Brandt L, Li H B. 2003. Bank discrimin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deology, information, or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3): 387-413.
- Cohen L, Coval J, Malloy C. 2011. Do powerful politicians cause corporate downsiz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6): 1015-1060.
- Faccio M. 2006.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1): 369-386.
- Jones B F, Olken B A.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 835-864.
- Julio B, Yook Y. 2012.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7(1): 45-83.
- Lenway S A, Rehbein K. 1991. Leaders, followers, and free riders: An empirical test of variation in corporate political involvement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4): 893-905.
- Lerner J. 1999. 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SBIR program [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72(3): 285-318.
- Li H B, Meng L S, Zhang J S. 2006.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J]. *Economic Inquiry*, 44(3): 559-578.

- Peng M W, Heath P S. 1996.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2): 492-528.
- Shleifer A, Vishny R W.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4): 995-1025.
- Xu C G.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1076-1151.
- Yonce A T. 2010. Uncertain growth cycles,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dynamic hedging [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ntrepreneur + Official” Cooperation Policy and Enterpris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Data (CPES)

Songqin Huang¹ Xiaobin He² Hao Gao³

(1. Anhui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2.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3. Tsinghua University, PBC School of Finance)

Abstract How to find a suitable stat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ntrepreneurs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in corporate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Using the 12th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Data (CPES) in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ntrepreneur + Official” cooperative policy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nvest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ntrepreneur + Official” cooperativ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increases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after using a series of sensitiv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stable.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finds that the cooperative polic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by mitigating the difficulties of corporate credit financing,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also finds that, relatively speaking,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no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without government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operative polic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nvestment is stronger. Finally,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ffairs obtained by the firms which have cooperated with government policy constructions will be higher, indicating that the cooperation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optimizing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enhancing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mproving the enthusiasm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make suggestions and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discussions will help to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also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 + Official” cooper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nhanc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s and perfecting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JEL Classification M21, P16, D21